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尚宏
著

文化 传播与 翻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文化传播与翻译

尚宏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传播与翻译 / 尚宏著.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81091-747-6

I. 文… II. 尚… III. ①东西文化-传播学-研究 ②翻译-研究

IV. G206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2886号

文化传播与翻译

出 版 人 马小泉

总 监 制 杨长春

责任编辑 杨海燕

装帧设计 秦 奔

策划:  河南大河大图文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 28 号河南日报报业大厦 (450008)

发行热线: 0371-65388221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地址: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 475001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开封日报社印务中心

版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5.5

字数: 150 千字

定价: 20.00 元

ISBN 978-7-81091-747-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河大图文传播有限公司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作者（中）作为译员出席2007年河南省人民政府新年招待会，右一为河南省省长李成玉，左一为在豫工作的英籍教育专家。



2004年8月，作者（中）在英国Milton Keynes College交流学习。

序一

尚宏女士著书，嘱作序，遂得首睹本书之风采，先赏此著之宏意，泛舟其间，享花浴景，摘金采银，获之颇丰。

《文化传播与翻译》不言自明，是对文化传播和翻译的研究。文化，是一个涵盖很广的概念，它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民族不同，文化各异。其多彩文化，唯依传播，才使人类共享。而传播诸手段中，翻译居首。翻译，与语言俱来，源远流长，处纵横之中，涉宽及广。它应传播之需而生，随传播之盛而隆。翻译，无语言而不行。语言是文化之组成部分，又是文化传播之载体。操不同语言的民族间文化之交流，非翻译不能成就。然翻译，非单枪匹马所能奏效，它既离不开语言本身，也离不开有关语言学科的研究，如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语源学等等的支撑；同时它还需要逻辑学、心理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符号学等学科的辅佐。几乎所有这些，在书中都得以探讨，彰显著作之综合性与全面性。

于文化传播，作者褒扬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历述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播的历程，评价了中华文化对西方的巨大影响，融知识性、思想性于一体，足见作者之良苦用心。于翻译，本书论述了英汉、汉英翻译理论与技巧，为读者从事翻译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其研究之深入足显著作之深厚及系统性。

在我国，相关学者对传播学与翻译学的研究较多，但对其交叉理论的深入探讨，迄今尚较滞后。对文化传播与翻译，本书纵溯其源，回顾其历史和发展过程；横及其伴，阐述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左右关联，分析其性质，综述其功能。它的问世，对传播与翻译研究之兴旺发达，无疑是一大贡献。深望此书之后，能有更多的传播与翻译研究成果出现，促翻译茁壮、昌盛，使传播优质、高效。

是为序。

李云楼

2007年10月15日于郑州大学

1

序二

尚宏女士的《文化传播与翻译》一书，研究的主要是英语世界与汉语世界以英语、汉语为桥梁的交流传播历史。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翻译史和世界文化史上一个重大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事件，即发生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前期的“百年翻译运动”（约公元830年至930年）。它不仅将濒临湮灭的许多古希腊科学文化著作很好地保存了下来，还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几百年后，欧洲全面的文艺复兴兴起了，而构成其基础的，正是“百年翻译运动”的伟大成果。这一段文化因缘当代人已经大多不甚了了，根本不会想到西方现代文明开端的“文艺复兴”，原来是跨文化传播的结果。

今天，人们虽然同为当今时代的“地球村民”，但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影响主要还是依靠翻译，可以说：离开了翻译，就不会有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传承。

这本书明显地让我感受到了一些独到之处。譬如作者在书中谈到的梁启超所论三个时期，实际上是对西学东渐在认识上由表层逐渐深化的过程，即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过程。这不也正是近三十年来当代中国所再次经历的过程吗？我们今天所说的提升“软实力”，其核心也正是文化层面的问题。还有“纵观人类翻译史，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产生影响力的历史”，“翻译不只是一项纯粹的语言转换活动，也不仅仅是一门创造性的艺术，它还牵涉到各种文化因素的传承与交流。”这类睿智的见解书中俯拾即是。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虽然不是史或论上的系统之作，而是若干点的集合，尽管从文化传播的视野来看有“挂一漏万”之嫌，但 these 个个“一”却都是重要的“一”，任何一个领域，这样的书多了，繁星点点的星空就出现了。

白 贵

2007年11月21日于河北大学紫园

目录 | CONTENTS

序一	李云楼	1
序二	白 贵	2
绪论 翻译学与传播学		1
第一章 中国的英语翻译与文化传播		9
第一节 近代西方与封建中国接触所形成的文化传播		9
第二节 近代西方著述中的中国形象及其传播效果		17
第三节 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与英语汉译		28
第四节 近代英汉翻译先驱的文化传播贡献		34
第五节 近代英汉翻译理论及其传播学特征		43
第六节 英汉翻译代表性著作所传播的思想精神		47
第七节 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与西方文化传播		52
第二章 中国的西学与西方的文化传播		59
第一节 近代的西学东渐与中国人海外求索		59
第二节 民族战争引发的西方文化热		65
第三节 现代中国人在西方寻求真理		71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77
第五节 《资本论》的翻译与影响		83
第六节 中国人通过翻译介绍西方文化		88

第三章 中国文化向西方世界的传播	95
第一节 中国名著在西方的传播	95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世界的影响	101
第三节 孔子思想在西方世界	107
第四节 新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形象传播	113
第五节 英语热所体现的文化传播	119
第六节 留学潮对文化传播的推动	125
第四章 英汉翻译的语言文化传播	132
第一节 英语汉译的技巧与理论	132
第二节 英汉翻译的传播学特征	139
第三节 汉语英译的技巧与理论	145
第四节 汉语英译的传播学特征	155
第五节 英汉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161
第六节 传播学理论对英汉翻译的启示	167

绪论

翻译学与传播学

从传统上看，人们将“翻译”仅仅视为一种技艺，并没有将它提到“学科”的高度。这是因为，翻译作为一种社会交际手段，虽然历史悠久，但并没有与大规模社会生产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挂钩。在远古社会，“翻译”仅仅是供使役的一种“谋生之道”，其社会交际功能非常有限。人类社会进入19世纪后半期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语言接触突破了宗教和外事的狭窄领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大大增强，语言接触扩大化、多层次化，进入了多学科发展的新时期。语言学无论是在理论深度、科学性、系统性以及有待开拓的前景方面都今非昔比。近五十年来对翻译的科学研究影响最深的是索绪尔（F.de Saussure）关于语言符号的理论、描写语言学关于语言结构分析的理论、功能语言学观以及转换生成语法关于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理论。

迄今为止，在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个过程中，特别是与之相应的语言学的发展演进过程，大抵映衬了翻译从“技艺”到“科学”的发展背景。长期以来，不论在中国或在外国，翻译理论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翻译学”界说不明，范畴研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受语言研究的限制。可以说，历史旷乎其久的译论论坛命题相当有限，著作寥若晨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在方法论上，翻译论坛基本没有脱出经验论的窠臼；在观念上，翻译界对翻译理论或多或少都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从事翻译或教翻译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或那样的“翻译套路”能成为

“理论”，当然也就更弄不清“翻译理论”有什么用。有些人甚至认为根本没有什么翻译理论，即所谓“翻译无理论”论。纵观中外译界，为数不少的有志者正在努力研究翻译，努力创建不同的翻译理论模式。译论著作虽然不能说已经蔚然成林，但也不应漠然视之。现在，翻译研究界在观念上、认识上的突出问题，似乎是对翻译理论的价值抱着不同程度的怀疑态度。因此，要建设中国的翻译学，建设有汉语参与的翻译理论，首先要提高对翻译理论的职能认识，在观念上有一个基本的改变，才能在研究上有所作为，在研究水平上有所突破，架构起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

19 世纪后半期以前，有关翻译的论述大多是文学、哲学大师们的哲学—文艺美学思辨，他们关注的大都是个人行文风格方面的问题。中国宗教经书的译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特别是在“文”与“质”的美学命题及翻译方法论及翻译原则的论证方面，为我国及世界翻译史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文献。中国的传统翻译学理论主要根植于中国的古典哲学—美学思想的土壤之中。中国译论很早就提出文与质、信与美的问题，即内容与形式的美学命题，嗣后直至严复的“信达雅”，绵延达千年。这个命题为什么有这么强的生命力？中外各有其不同的哲学—美学渊源为之提供思想和理论依据。可以说，中国的古典文艺美学思想比西方早一两百年。西方哲学中首先提到词章美学的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BC ~ 43BC），在中国则是孔丘（551BC ~ 479BC）。中国译论中文与质的命题实际上渊源于孔子的“尽善尽美”论。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理想的美学境界是“文质彬彬”。他的具体解释是文辞要“修饰之”、“润色之”，但又不能失之于雕琢而导致“巧言令色，鲜以仁”。他提出“辞达而已矣”，影响极深，至苏轼而立“辞达”说。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显然与之一脉相承。除孔丘外，庄周（369BC ~ 286BC）提出：“朴素而天下某能与之争美”，坚决反对“以文灭质”。荀况（313BC ~ 238BC）主张“美善相乐”、“文貌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强调文与质的辩证关系。韩非（约 280BC ~ 233BC）主张文从属于质，强调社会功效，“文为质饰”，文与质成反比互相消长等等。历代哲人的哲学—美学思想，正是中国古典译论的理论思想源泉。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在范畴研究及方法论中都借助于中国古典美学。中国古典美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手段,即文、质、神、形、气、志、风骨、意境、神思、比兴、虚实、变通等等。这些范畴,广泛涉及翻译作为艺术创造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审美规律、审美标准、审美主体的心理因素以及翻译美学的社会功能等等问题。几乎在每一个命题范围之内都要求我们投入悉心周密的科学研究,以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立意于开拓、创新。

中国古典美学深深地渗透到中国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素质和心理意识过程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开拓与创新。我们可以把翻译审美意识的特征、翻译审美意识中的主体与客体、审美过程、翻译的审美标准及符号系统(审美意识的传达与转换)以及模糊集合问题、翻译学科边缘化问题作重点,建立起我国翻译美学的科学的基本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传统科学突破了原来的框架,新兴科学技术相继产生,汇合成了所谓“横断科学”领域,从而促进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并由此而推动着对翻译的科学进步。现代翻译理论研究工作已突破了传统的理论命题和方法论,在翻译的实质、原理、原则、程序和方法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各种翻译理论基本模式,力图运用以客体为本的论证方法,对翻译史的探讨获得了颇为世人瞩目的进展。

当人类前进的步伐迈入21世纪,科学探索和人文精神从矛盾走向沟通,东西方文化由冲突转为融合,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日益凸显。作为研究翻译的独立学科,翻译学正是在这种时代性的学术氛围内孕育诞生并且茁壮成长起来的。与此同时,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翻译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悠久的一种客观存在,如果仅仅被看作是某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要把握其各个层次,廓清其全部规律,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指出,译论研究不仅要探讨翻译的内部规律,还应该整理其外部关系。换言之,要使翻译学这门边缘性学科取得巨大进展,必须充分利用相关学科的成果。因此,翻译学应该呈现出开放的状态,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积极致力于汲取他们的前沿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对翻译实

践进行多维的、交叉的、综合的探讨，以便揭示翻译活动的内在规律和外部联系。

翻译不只是一项纯粹的语言转换活动，也不仅仅是一门创造性的艺术，它还牵涉到各种文化因素的传承与交流。语言是文化的物质载体，艺术是文化的集中表现。作为一门语言艺术，翻译也自然带有鲜明的文化色彩。离开了翻译活动，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交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翻译这种文化现象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的兴趣，正因为翻译活动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交际过程，它不仅受制于文化，同时又对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因而翻译被看成是重写，是操纵，是一种有明确目的的社会行为。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翻译活动对于世界各国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对于全人类文明的建设，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全面客观的译论探讨既要着眼于翻译活动本身，也应关注其外围的大文化系统。

翻译中对于原文的理解和表达，不仅是从原语的能指到所指，再到译语的能指这样一个简单的语言破译问题，还在更深层次上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各族文化的差异，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于相同的表达作出不同的心理反应。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是否准确，译文的表达是否恰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原语文化的了解程度。“翻译的难与易、优与劣，与其说与语言有关，毋宁说主要与文化有关。”将翻译置于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到，翻译活动，包括翻译批评，都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都会受到社会时代因素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制约。翻译事业的发达与否，也与翻译的目的、社会的反响以及文化的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剖析翻译的文化层面就是要在广阔的社会语境下，从历史的角度对翻译进行宏观的思考。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翻译一直是传播外来知识、发展本国文化的重要渠道。有学者指出，人类的翻译经历了口语翻译阶段、文字翻译阶段以及文化翻译阶段。我们当前所处的正是文化翻译阶段，在这一阶段，翻译已经成为民族间全方位的文化交流。有鉴于此，“21世纪中国翻译学应该站在对20世纪乃至有史以来中国及世界各国翻译学传统进行文化批判的基石上，对现实的翻译问题进行文化的分析，探求与新文化发展相符合的翻译学道路。”通过考察翻译史上的文化

交流,进一步树立起翻译的文化观,将对传统的翻译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拓宽译学探讨的视野,从而促进翻译理论体系的构筑和完善,为新兴的翻译研究发展成为一门严肃学科提供重要的契机。

传播学是与人类一起产生和发展的,但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是20世纪初才由西方学者发起的,不过发展得很快。从历史上来说,第一个传播技术是修辞学,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韩非子都是这方面的先驱。但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传播学是从20世纪开始的,它的基础学术流派是在40年代到60年代形成的。

控制论模式是传播学的第一个基础流派,它在象征化水平上和内容传递机制上表明传播是一个过程,同时也是这个过程的结果。

知识和信息传播速度的增长和数量的扩大是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加速度现象,涉及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对一个信息或一种信息传播行为的解码,首先就假定它进入什么信息传播范围,并与这个范围建立一种关系。控制论的问世提出了一个问题,大众媒介带来的信息瀑布对信息传播的主体——人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因为传播动作本身总是和其他东西相互关联的,如社会经济基础、文化符号系统、媒介的技术特性、对信息起扩散放大和中继站作用的体制等等。传播学的学术使命是研究事务的流量状态和动态中的复杂性,控制论是第一种方法论式的考察方式,使我们在信息面前获得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责任心和参与意识。

与控制论同时问世的另一种思想方法是系统论。贝朗塔菲在1933年发表了代表作《系统理论》。系统论是要定义出系统的边界并把系统模型化,以便认同其中重要的组成因素和这些因素之间的反映类型,最后决定个体和整体的联系。

美国学者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探索成型的经济—功能主义学派,在部分西欧国家和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拥有更大的学术影响。这个方法论在讨论与媒介、职业新闻机构、记者职业群体的关系时都有很强的解释力。

在知识领域,结构主义是20世纪中叶的一个学术高峰。结构主义从语言学出发扩展到其他人文科学领域,如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翻译学和精神分析等,并成为传播学的一种方法论。结构主义方

方法论对传播学的学术思想有深远和持久的影响：（1）从文学作品的研究出发建立对叙事结构的分析，尤其是对报刊的表述，对广告信息的产生和研究方面；（2）大力强化对视觉信息的分析，衍生出后来的符号学；（3）在法国崛起的结构主义方法论留下的另外两个重要思想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福柯的监视装置理论。

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传播学的学术思潮围绕着三个奠基性的大流派基本成型。控制论、经验—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这三个流派迅速激起学术界和职业界的兴趣，占据政治—文化的前台位置，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学术自治。

然而，就在传播学形成基本学术格局之时，就面临着要求扩大学术范围的挑战。风雷激扬的20世纪60年代对西方社会思想的学术更新起到了关键作用，是传播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学术思想和趣味开始分化，一些新思潮开始以批评的姿态或“合作”的口气力图渗透进传播学的学术领域。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传播学学术领域中有建树的新学派主要有五个：

第一个学派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批评。美国学者F·麦克卢普在1962年出版的《知识的生产和分配在美国》首先创立了一套针对组织和信息的成本和分析方法。同时，传播理论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批评还引进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

第二个学派是语用学。语用学pragmatics这个词源于希腊文的Praxis，是指一种主体和主体的语言应用关系。

第三个学派是民俗人类学传播学和社会互动反映理论。这在理论渊源上与德国社会学家G. 齐美尔的社会性理论和美国人类学家米德的交流行为理论有衍生关系。

第四个学派是技术和调整社会学。这种学派把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和调节机制结合起来考虑。

第五个学派是信息接受理论和媒介消费理论。我们可以说信息接受是一个被隐藏的纬度，涉及到读者、观众、使用者或消费者。

我国对传播学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和介绍，是1978年以后的事。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比内地起步早一些。学者们在

各自的研究实践中体会到，传播学研究学在经过引进介绍以后，不能只依赖于西方人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方法，中国学者要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就必须研究中国的传播实践。于是“传播学研究中国化”、“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提法就产生了。在中国文明史中，有大量的先人总结的传播观点和原理，有不计其数的传播事件和现象，这些丰富的宝藏召唤着我们去发掘。

翻译学的外化和传播学的边缘化使这两门学科得以结合，促使跨文化交流学产生。跨文化交流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一门以翻译学为基础的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从上一世纪以来已有许多文化人类学家进行过论述，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跨文化交流学却是在70年代末形成的。跨文化交流学是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而诞生的，这使它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实用性。

我国对这一学科的介绍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要著作有胡文仲主编的《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英文，1988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霍尔的《无声的语言》、《超越文化》以及萨姆瓦等人著的《跨文化传通》等著作也在80年代译成中文出版。此后中国学者的相关著作也相继出版。

不同文化的交流，对人的个性和属性的发展，对一个群体，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走向都会产生影响。在今日人类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环境中，文化的相互影响也在加大加快。避免误会，进行有效的交流，建立人际间良好的关系，增进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理解、合作，在国与国之间促进彼此的友好相处，人们需要了解跨文化交流的知识，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本书是一本概论性著作，力求凸现翻译学、传播学和跨文化交流学之间的关系，不求阐释的周全详实及例证的丰富多面。本书采取概论性体式还立意于抛砖引玉，希望引起翻译界、传播界、跨文化交流界以及广大学术界的深入探讨，使我们能在充分利用当代科学发展成果的条件下，在本世纪建立起中国的当代翻译学与传播学，为人类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

2007年8月

7

参考文献

- 【1】谭载喜，《文化对比与翻译》，《中国翻译》，1986年第5期
- 【2】谢天振，《论译学观念现代化》，《中国翻译》，2004年第1期
- 【3】张柏然、许钧主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 【4】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1
- 【5】俞佳乐，《翻译的社会性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0
- 【6】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0

第一章

中国的英语翻译与文化传播

第一节 近代西方与封建中国接触所形成的文化传播

文化交流不仅是人类社会常见的现象，而且也是社会文明不断推陈出新、发展进步的酵母。中国近百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实得益于中外文化(主要是中西文化)的大规模碰撞、交流，这几乎已成定论。

时至近代，满清王朝腐朽没落，中国文化的发展停滞不前，落后于世界列强的文化发展步伐。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满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古老的中国被强行拖入近代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潮中，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成为必然趋势，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中国的外交、教育、文化传播、文化观念等在“被迫近代化”中蜕变，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很清楚地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史分为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时期和鸦片战争以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其中，对于“封建社会”的文化传播历史，我们又可以分为华夏文化的内部传播以及华夏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传播和交流。鸦片战争以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文化传播历史比较特殊，但也可以归入到“华夏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这一时期，即为典型的“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文化传播活动。

东学，是指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包括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文化），这里主要是指中华文化，即中学；西学，指的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即指的是中国传统